



我的
文学
渊源

索然 编著

目 录

倾 诉

- 3 两栖及其它
- 29 用心写
- 36 寻常物与别样情
- 39 炊烟·草芥·锄犁
- 42 半途的收获
- 49 半江瑟瑟半江红
- 53 听龚乃全聊《烟缸闲趣》
- 63 儒者雅趣
- 72 人言无用是书生
- 74 文章修改经验谈

聆 听

- 87 秋 实 投入到另一种疯狂
- 90 宋世宏 薄庆田 高调做事 低调做人
- 93 张东焱 客散初晴后 僧来不语时
- 100 杨迎新 人生智慧的感悟与寻觅
- 106 张立泉 平凡的感动
- 109 劲 弛 无悔的追求

- 111 赵国英 为《粪箕子》叫好
- 113 方 明 乡音无改鬓毛衰
- 116 古 枫 从灵魂深处挖掘
- 122 墨 瑶 水从孤竹过来清
- 125 田 歌 真实的生活 真实的人性
- 127 赵 朕 斑斓多姿的民俗风情画卷
- 133 关仁山 味从无中来
- 136 张绍臣 沙土地的历史哲学
- 139 郑国双 月是故乡明
- 142 张东焱 唱给旺根草的歌
- 148 杨立元 丰富多彩 灵动多姿的乡村图景

倾 诉

两栖及其它

——我的文学情愫

龚乃全

文学是我的人生伴侣，不知是不是命中注定，还是别的。

生命的支流

我在开滦工作了 38 年。开滦培养了我，锻炼了我，给予了我。为开滦工作，成为我生命中的主流。

从 1974 年从事业余文学创作，已经 38 年了。文学是我生命中的支流。

38 年间，我在《开滦矿工报》（现在改为《开滦日报》）、《唐山劳动日报》、《唐山晚报》、《唐山电台》、《杂文界》、《中国煤炭报》、《祝你成才》《新青年》、《唐山文学》、《阳光》、《滦河文化研究》的媒体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，《勤奋篇》等文章被选入《小学语文同步训练（6 年级）》、《追日集》，2004 年出版个人文集——《半途而废》、2005 年，加入河北作家协会。2006 年出版休闲散文集——《烟缸闲趣》。2008 年系列乡土散文《沙土地》被《唐山文学》专刊刊载。前前后后，算来也有 50 万字吧。

作为一位业余作者，我的文学之路是平平坦坦的，

断断续续的，轻轻松松的。首先，我为文，从没有过外界的压力与干扰，全是自发，只为自己，只对自己负责的。其次，我的作品从来没有获得过学校以上级别的奖励，因为我没有在意过形形色色的征稿评奖的通知与广告。再次，我为文，只为消遣，没拿它当成什么，因为我的收入一直保持在同龄人平均朝上的水平，而高级经济师的职称，已经是我从事的岗位的尽头了，而且收藏家的名录中也写进了我的名字。但是，我始终与文学为伴，文学与我也保持着清纯的恋情。因为：文学，是我坎坷人生的征途中，一时冲动激愤，不发泄难以自控的钢铁管路；是我复杂多变的工作路途中，不可或缺的恬静小憩的碎石岔路；是我在知天命之后，恣意妄为而又平和恬淡的水泥宽路；是我退休以后，休闲散步而流连忘返的乡间小路。

我有过当作家的梦想，那是乳臭未干时的懵懂。我有过出一本集子的设计，那是青春得意、意气风发时的萌动。但，我最终没有选择作家作为自己的职业。是因为，我身在开滦，我是开滦工人的后代，开滦人一脉传承，以“做窑”为天职，爸爸是这么告诉我的，师傅是这么教给我的，使我骨子里充斥着：“吃饭就靠铁饭碗”的顽固信念，那时，我对作家这一行当了解的并不多。后来，正是靠着自我打拼，靠着家人的奋发，我的家境基本处在富裕小康的水准，用不着以文字换金钱来糊口御寒。但是，我应该感谢文学，她对我始终不离不弃。她让我宣泄，让我诅咒，让我寄情，让我抒怀。她给了我激愤，给了我抚慰，给了我滋养，给了我柔情。

其实，文学给予我的不止是情感的寄托，她还锻造我的意志，催化我的理智，强化我的洞察与解剖，丰富我的想象与推理。这些，间接地辅助了我的事业，让我在工作中游刃有余。

间歇的流淌

断断续续，是我业余文学之路的最显著特点，像故乡的那条小河，属于季节河。

第一次作文获奖，也是我有生的唯一一次。那是1964年下半年，在开滦二中。当时，我上初中。学校组织作文比赛，我拿了一个2等奖，奖品为陶铸的《松树风格》。同学们羡慕的眼光，强化了我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信念。

第一次写稿子，是在滦县全县教育工作会议上做教学经验发言，获得成功。那是在1969年，我下乡当民办教师的第二年。20岁的我，用得当的文字表述了自己独特的数学教学方法，征服了每一个与会者，成功的喜悦，溢于言表，也是我认识了文字的传达和辐射的力量。

第一次将自己所写的文字化为铅字，还要追溯到1974年，一篇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言论发表在《开滦矿工报》。25岁，在报纸上发表具有理论分量的文章，在很多人的眼里，简直就是奇迹。在那之后，写作的兴趣被激发出来，篇幅不小的言论文章接连在《开滦矿工报》上亮相。1976年11月，我被提拔为矿上革命委员会的宣传科长（相当于现在的宣传部），准确地

说，副科长抓全面工作。那些文章无形中被当作一种特殊的能力，成为我被提拔的一个重要依据。

那个时期，我的本职工作是党委学习中心组的干事，不光要记录，而且要辅导。当时，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背景，学习马克思、列宁、毛泽东的主义是第一位的头等大事。为了胜任本职，啃领袖的原著成了我日常唯一的首要活动内容。特别是毛泽东的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几乎被我翻烂了，辩证唯物主义、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很快就成为我认识世界、分析事物的思想武器。这些为我日后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。同时，毛泽东文章的缜密性、鲜明性、充实性也成为我日后写作的文字范本。

1980年，我的第一篇真正意义的杂文《小议护短》，鞭笞新时期依然存在的人性劣根，在《唐山劳动日报》发表。它标志着，我正式跨入文学之门。我给自己定下了座右铭“日有所学，周有所得，月有所成”。我坚持了，而且做到了，每个月总会有一片稿子见诸于市一级的报端。

也就是在那时，一篇稿子，被人稍作修改，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。我的内心被激愤充填，我痛恨以偷盗为伍的剽窃。但是，我默不做声地压了下去，只当没事一样。社会就是社会，龌龊与光明并存，在乎名，人之情理。之后，我中断了写作，一停就是3年。

1986年，我的文章先后被江苏《祝你成才》和《黑龙江》的《新青年》采用。在那个全凭自身能力确保文章质量，没有邪门歪道和暗箱操作的背景下，人们的肯定是由衷的。《唐山劳动日报》的副刊组长周询曾

经对我寄予希望，热情地怂恿我——为出一本集子而努力。

我接手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，步入开滦矿务局的副处级领导岗位。由政工向经济转身，没有华丽而言，只有一堆又一堆的难题等待破解。业余文学之路由此戛然而止，精力放在冲破外行跨入内行的隔断。十多年间，只是偶尔心血来潮。

2004年，我的第一本书出版。这年年初，我的工作得到调整，工作压力骤然减轻，几乎到了无所事事的地步。在这之前，也许是文学给我干练，给了我聪慧，我始终抱着“宁可猫腰拣，也不跳脚摘”的信条，未雨绸缪，亡羊补牢，信马由缰似的工作着。那时，我写了一些类似随笔的东西，很受读者欢迎。那些经过人生历练的感怀，带有丰富哲理的精悍短文，触发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思考，引发共鸣。我深深感到：文学，不仅需要阔斧与重锤，还需要剪刀与羹匙。写作的激情再一次燃烧，一篇篇从经历中筛沥出来的闪光的东西，接二连三的出现在报纸上，也为我的第一本书增添了时代的色彩。《半途而废》印出来了，投入市场，反映强烈，二次印刷。共印6000册，卖了5000，读者大多数是那些中学生及教师。大概因为，一本20万字的书，由100多篇文章组成，几乎全是千字文，很适合他们阅读。

2006年，我将收藏烟灰缸以来所作的笔记与抒怀文章进行整理，发现竟然已经有了40多篇，十几万字。这些，不经意中留下的文字，来自收藏过程中的感悟与发现。年底出版，应该说它是国内第一本有关烟灰

缸的书。直到此时，我对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有了更加理性的认知。

退休了，解放了，不再拘禁，不再矜持，不再装模做样。翻看有关故乡的几篇旧作，我突然发现了更大的空间，那里有更多活灵活现的灵魂在呼唤。于是，我来不及整理思路，三个月的时间，10万字，饱含浓郁的风情，饱含醇厚的怀念，以游子祭拜式的回忆为主线的系列散文《沙土地》出笼。刊出后，在社会产生影响，长正、田歌、赵朕、张东焱、墨瑶、关仁山、杨立元等文学前辈和老师，都给与多方面的肯定与赞扬。此时，已经是2010年年底。

两栖的尴尬

历史，寻找必然原因；文学，发现偶然事件。

我出生在唐山解放与中国建国之间，一片滦县辖区的沙土地。

爷爷给我起了个乳名——乃迁。大字不识的农家汉居然起得出文绉绉的名字，让人不可思议。（《自报家门》）

故乡，在城乡结合部农村一侧。往西，可以看得见沙河那边煤矿飞转的天轮，听得见悠扬的汽笛。往东，往南，往北，则被一色黄黄的沙土地包围。滦河流域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，我从小耳濡目染的是——皮影、大鼓、秧歌、落子、剪纸；种植、编制、压榨：纺线、织布、印染……我从小得到的是纯净的生活底色，善良质朴的裸露，丰富文化的滋养，细腻情感的

呵护……（《找乐儿》）

几年后，我和爸爸妈妈进了城里，由农业人口变为城镇人口。这里，有电灯，有商铺，有剧场，有照相馆，拉洋片的、卖对虾的、变戏法的……洋制服、花裙子，大背头，波浪式，车水马龙，比肩接踵。新奇异样的另外一个世界，让我在惊诧中慢慢融入其中，现代工业文明让我享受着与农村截然不同的生活。

多年后，我又重回故乡，尽管身份由市民改回农民，小名叫做知识青年。类似两栖类动物的沉重转身，更加加重了我的故乡情结。那是个户口决定终身的年代（《户口本》）。

1971年我进了开滦，凭着文字功夫，我很快就走上中层科级岗位。多年的政治工作，使我在其所属领域已经驾轻就熟。渐渐的，我又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陌生与厌倦。尽快逃离的欲望日渐强烈——跳槽转行干行政。开滦将两栖的机遇给了我，我以优异成绩考入“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”，学习企业管理专业。很快，三年学成回归。那个年代，学历被推到从没有过的高度。

当时，开滦正在整党。这是三中全会后，我们的党为清除“四人帮”的影响而开展的必要的整顿，重要的一个内容之一就是清理“三种人”——那些借“文革”之机迫害好人的坏人。

我痛恨那些祸国殃民的家伙。因为我也曾经深受其害。原因很简单，因我的家庭出身而起。我的家在土改时确定为中农成分。本来，爸爸在开滦下井，按照政策规定，应该是以他的收入为标志的我

家定为工人成分才最合适。就是因为我家属于两栖——工农兼户，而城市民主改革晚于农村的土地改革，就这样稀里糊涂下来了。那时，人们也没有拿这个当太大的事，除了“地主和富农”。可是，“文革”一闹腾起来，成份就变成一种政治标准了。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”，地富反坏的后代统统成了狗崽子，中农、上中农、小商业主的后代就成团结教育的对象了。奇妙的逻辑把我孤独起来，受到最需要尊重时期的歧视与冷落，运动之前，我可是一班之长。好在下乡时，没有再按家庭成分排队，即使排了，也是影响了高三和高二，我所在的高一可是全部拉。（《糗糊桶》）

我所在的党委早就对我的文革经历做了全面调查，尤其是对一份间接的材料提出的“莫须有”的疑问，慎重地多次取证，证实了我的清白。可是，有人居然企图推翻刚刚形成的正式决议。他指使调查人员采取卑鄙手段，施加压力，引供诱供。本来，组织上在我上学之前就有提拔的意向，结果，一直拖延了两年多。后来，有人揭开了谜底，原因很简单，用那个人的话说，“想干政工就干政工，想干行政就干行政，开滦成他家的了？”嫉妒，国人的劣根啊！可是，毕竟正义还在，组织上给了我客观的结论，并让我走上了处级领导的岗位，使我的两栖梦想最终实现。（《半途而废》）

挫折是一种淬炼，它给人生的里程立下了一块界碑。污秽无法回避，选择的只有保持自身的洁净。我没有秋后算账的打算，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反面教员。因为，在我的人生词典里找不到“以牙还牙”，只有“以

德报怨”。我想，一个人的一生最好是有一两个反面教员，如果没有，也是一件挺遗憾的事情。（《从挫折的烦恼中解脱》）

两栖，有偶然的跌宕，又有必然的蜕变。转身不仅只有华丽，也有卑微。对我来说，这些太珍贵了。身处两个不同环境，冷与热，水与火，动与静，美与丑，迅速的反应调试，嬗变后的进入角色，身临其境的强烈感受，施展身手，作为一番，总比听别人说来要生动得多，就好比到现场参与同看电视直播的区别一样。（《知了猴儿》）

经历，是创作的源泉；淬炼的经历是灵感的导火索。

生死的跨界

死亡是人生形态的最终形式。起死回生，最为难得的是感悟颇多。

我的人生中有过5次死亡边界旅行的经历。一次是5岁时得了疟疾。在那缺医个少药的年代，得这样的病是会死人的。可我没死，因为，得病时，我和妈妈正在爸爸所在的部队探亲。爸爸参加了抗美援朝，在吉林的空军后勤部汽车驾驶学校当教员。部队的军医救治及时，免我一死。（《昔日，你扶我走过》）一次是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，我和所有亲历者，浴火重生。另外三次，极具特殊性。

1966年，毛主席的号召：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泳。学校组织我们去了陡河，河里黑压压一片人头，分不

出谁是谁。我不会水，我的教练（同学）又没有耐心，说了一遍要领，让我自己练，他就去撒欢了。我踩着河底，摸索前行，谁知道一脚滑入坑里，立即灭顶。幸好“教练”还有照管我的意识，及时发现险情，回过身来，游到近前，一把探住我的头发，将我救上来。踩肚子，往外控水，折腾了好一阵子。咳，那次后怕得出的教训是：人，不能不知深浅。

1969年，在县里教育系统的大会上介绍经验之后，我为自己的成绩沾沾自喜，美美唧唧，在下了火车，穿行多股铁道时，依然沉浸在不可言状的喜悦中，一列停在轨道上的列车阻挡了视线，当我迈到另一条轨道的道心子时，一个车头呼啸而来，我傻了，不知所措，幸亏同伴拉了我一把，躲过一劫。惊魂落魄的感觉是惊骇的。谁让我忘乎所以？！我懂得了，乐极不仅生悲，而且可以命丧黄泉。同伴于生死关头的救助，刻骨铭心，他让懂得了许多。从那以后，我对需要的帮助，从来没有一丝犹豫。（《管校代表》）

1970年，我为了研制一种促进瓜果增长的生物菌，差一点被煤气熏死在实验室里。那次，是煤气中毒的常识促使我挣扎起身，蹭出了一条生路，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4个小时，初冬的细雨浇醒了我，更准确地说，老天不忍心将一个想为乡亲们造福的好人迎进天堂。那次的经历，使我更加尊敬伟大的自然。（《救命雨》）

生死历练，得到精神上的升华，也是一种上天赐予。人生观、价值观往往会因死上一回而变得越加明

晰和坚定。在刚刚迈入社会之际，这样的经历给了我正向的人生定位与强化。

蜗居的两栖

40岁以前，我的家，不只是狭小，而且一直是漂泊颠沛的，就像蜗牛一样。

1977年结婚，吕家坨矿工房区内，几根纤细木柱搭成房架，两块胶合板权作房顶，顶上铺沥青油毡、压砖头，新房就算有了，那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家。

当时，妻子是农代干，我是工代干，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两栖干部身份，通俗一点，就如两性人。这样的家庭组合，造成了双跑家，谁方便谁跑。

妻子在县里任组织部副部长，县委大院有她一间宿舍，那是我们俩临时的家。我在开滦林南仓工作时，执行大礼拜，每两星期休息一次，先坐班车，后坐火车，跑滦县。有了儿子后，县委大院的临时的家转为相对固定。以后，我在开滦钱家营矿工作，星期天骑自行车跑家，35公里路，两个多小时，顶风冒雨是家常便饭。

一段时期，妻子的工作几经调整，组织部副部长兼工作队队长、中学校长、人大文卫科科长。因此，李各庄大队、雷庄中学，也曾是我们的落脚之处。

后来，妻子搬到仁义胡同，一套带小院子的两间平房，成了我们固定的居所。那里，距滦河只有500米距离。

在北京学习期间，跑滦县的家，我只有一种选择——坐火车。放寒暑假，可以早晨坐车，中午到。从车站到县城没有现代交通工具，下车后，花上一毛钱，坐小驴车到县城。一般的假期，比如：五一、国庆，想回家，那就要抓时间赶傍晚的火车，火车到达滦县的时间大约是夜间 11 点，小驴车白天才有，晚上收车。没办法，两公里多的路程，只能靠步行。

一家人难得相聚，苦中有乐。我和儿子经常到滦河边，春天散步，秋天钓鱼，冬天沿着河套的柳树林捡树枝。有时到阁上解馋，滦县特色小吃——郝家火烧，再夹上肥猪头肉，我和儿子吃得满嘴流油。（《金鲤鱼的传说》）那个时期，我真正感受到了家的温馨。

1987 年，妻子调到开滦，我在机关的宿舍成为一家三口的临时居所，好在时间不长，我们终于有了正式的家——两居室的楼房。

1997 年，父亲去世后，我把妈妈接来一起居住，领导照顾，为我调换了四居室的宽绰的住房。至此，我们才算拥有了真正永久固定的家了。那年，我 48 岁。

如今，儿子在北京中关村安了家，孙女也四岁了。一家人团聚，孙女绕膝撒娇，家的温馨，给与我的不仅仅是满足，简直是沉醉。亲情是人间最为真切、朴实的感情。

那个年代，我们这一代人，家庭观念十足，对于近乎磨难式的跑家，谁也没有埋怨，似乎理所当然。而我的游击战式的奔波，能够体验过当时百姓